



大历史背后 是个体的吟唱和歌哭

□狄马

随着工商业文明的兴起，属于农业时代的民间艺术大多走向衰亡。这是大势所趋，非一时一地独有。像我文中讲到的陕北民歌、陕北说书、秧歌、老腰鼓、劳动号子以及各种风俗小调，都与某种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紧密相连，犹如皮之于毛。一旦这种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消失了，附着在它之上的各种民间艺术必然要消亡，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问题是世界性的。因此，才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倡议和行动。

当然，陕北的民间艺术由于其历史地理的特殊性，区域内人种构成、文化习染的复杂性，呈现出与周边地区截然不同的风格，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陕北民歌的大胆率直、敢爱敢恨的风格，完全打破了汉语文学“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审美传统。因为本地区历史上长期为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管辖，风俗习惯受游牧文化影响更大。人种也多由汉人与北方游牧民族融合而成。陕北说书则得益于地理上的封闭，完整地保留了自明清以降北方鼓词系统的讲唱曲目和表演形式，被誉为“民间叙事文学的活化石”。老腰鼓则是古时军阵演练的民间孑遗，混合了一些萨满教文化的残余，演变流传到现在。陕北方言中保留了大量的古汉语词汇，人称“听见古代”，最重要的原因当然仍旧是封闭。

遗憾的是，现在，这些由千百年来的农业生产方式孕育出的文明之花正变得面目全非。正如经上所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历史的沧海桑田，使得年老的异乡人归来恍如隔世，犹在梦中。

现在回到老家，感觉一切都变了。

信天游及各种俚曲小调成了舞台上拿奖的东西，真正在山里，反倒没有人唱了。问乡民，他们说：年轻人都走了，留下七老八十的，不是耳聋就是眼花，你让谁听了？会唱的那一辈人也大都走了。我采访过的老人，每年都要去世几个，勉强活着的也上气不接下气，咳嗽得唱不成了。这些老人去世了，葬礼上的唢呐仍旧朝着天吹着，但曲子已由《下兰坡》和《粉红莲》改成了《今天是个好日子》。正月里闹红火，腰鼓还会打起来，但目的已由“敬神”变为“娱人”，有年轻人参与，主要是因为正月里没事干，外面无工可打，而打腰鼓多少还能挣两个零花钱。酒曲作为酒文化的招牌菜，还会在酒桌上响起，但唱词已由颂赞历代英雄好汉，变为歌颂招待他们的老板。

一切都在变。有一句名言：大地总是属于活着的一代人。这话可以有多重解释。最普遍的说法是，大地是让人居住、耕作和利用的，死了的人不再有任何权利制约活着的人类。但活着的人类究竟应当怎样对待死去的人类？他们创造的文学、音乐、绘画、建筑……这些人类统称之为“文化”的东西，究竟应当不应当成为后人必须接受的遗产？后人在接受这些遗产时，应当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应当怀着“温情的敬意”、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存进博物馆、档案室，还是以一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将它们一股脑儿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真是一个问题。

就我自己的研究而言，那些在历史上存活几千年的古老民族，它的传



《歌声响处是吾乡》

狄马 著

领读文化 | 天津人民出版社

统必然是多层次的。比如，判定一个文明古老的重要标志，就看它是否有文字；但在文字诞生以前这个民族必然经历了更为漫长的口头叙事阶段。后来虽然发明了文字，但这种口头叙事的传统并没有随着文字的诞生而消失，而是静水深流，汇入到一条更为广阔、更为深厚的文化洋底中。这条洋底没有名字，姑且叫他“小传统”。其实，“小传统”不小，“大传统”不大，无以名之，是名为小。“小传统”是以口头语言为载体，主要由农民和乡村知识分子为创作主体，以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的民间文化系统。它与“大传统”，也就是那些以文字为载体，主要由官方文人和大知识分子创造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小传统”中那些不识字的乡民和识字不多的小知识分子有时也借助“大传统”敷演自己的作品。“大传统”中的文人灵感枯竭了，也降贵纡尊，到“小传统”中寻找灵感和野趣。但应当说，大部分时候它们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

《歌声响处是吾乡》里记载的正是那些被“大传统”遗弃的“小传统”中的艺人和作品。在正宗的官方典籍里，你找不到这些“小传统”中艺人的名字。他们的出生、成长和死亡，就像山涧里那些被羊咬掉的野蒿一样无人过问，但他们活在穷人的口头上，活在孤儿寡妇的梦中。韩起祥、张俊功、王学诗、张和平、鲁峰、熊竹英……这些名字与王向荣、马子清、杨巧、朱光亮、雒胜军一样，使得养育他们的大地变得氤氲起来。陕北高原有了这些名字和没有这些名字是不一样的。没有这些名字，一代一代的陕北人当然也春种秋收，生儿育女；但有了这些名字，干旱而苦焦的高原变得灵气十足，神气十足。

我还要说，每当到了历史的紧要关头，独裁者的怒火像野火一样要烧掉一个种族所有的文字和文物时，正是这些被侮辱、被损害的盲人或口头文学记录者保留了一个种族最后的记忆。一个种族的文化芯片就储存在这些人的喉咙里。它们烧不掉，撕不破，挖不出，令人惊恐莫名。

什么是历史？它是与人类的尊严和情感紧密相连的伟大记忆。因而，它的构成除了官方的文献、志书和考古发掘的文物古迹外，还应当包括个体的呐喊、吟唱和歌哭。甚至可以说，正是有了这些关乎个体生命存亡、苦乐忧患的点滴记录，才构成了一部真实的历史。甚至可以说，这些创痛酷烈的灵魂、疲惫不堪的嘶吼，显露出的生活真实要比那些经过“大传统”的文人精心打磨过的史料、传记和年谱还要靠实。



新书秀场

《高中生穷忙族》

日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在《女性贫困》的采访过程中，日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注意到，贫困女性用廉价化妆品和二手服饰包装出光鲜的外表，不少观众对其经济状况提出质疑。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贫困的未成年人身上。节目组深入采访后发现，这些未成年人背后的家庭都处于相对贫困阶段。“明明还是孩子，却被逼成了大人”的高中生穷忙族，在外打工挣钱、在家忙于家务，哪怕成绩优异，靠借贷型奖学金完成学业，也可能因债务压力而陷入更深的贫困。然而，即便拿出确凿的数据，认为“贫困并不存在”的人依然随处可见。“看不见”成为日本现代贫困的一个特征。要想让社会伸出援手，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打破阶层固化的魔咒，首先要让“看不见的贫困”可视化，这正是本书的意义所在。



让世界听懂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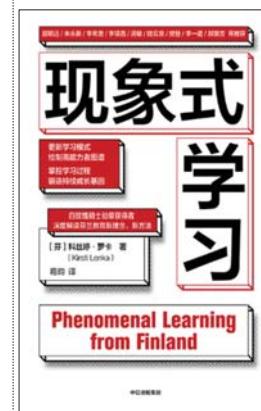
王冠 著

《让世界听懂中国》

王冠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世界各国之间的舆论博弈赛日益激烈，新闻现场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作为曾驻美八年的央视记者，王冠对此了然于胸。新书《让世界听懂中国》解构西方媒体的话语体系，揭示了西方塑造和抹黑中国的手法，并通过回顾与西方专家“南海辩论”现场，分享专访基辛格、克里、赖斯的幕后细节等新闻现场，让读者感受媒体现场的短兵相接、唇枪舌剑，窥见西方叙事的虚伪与偏见。作者对于中国的发声方式，以及对抗西方话语、构建中国话术等方面，提出了诸多建议和思考，比如用西方熟悉的表达技巧，讲述中国故事。通过本书，读者可以了解中国和西方的对话常态，并举一反三，感受世界各国之间的话语权较量。



现象式

学习

Phenomenal Learning from Finland

《现象式学习》
[芬]科丝婷·罗卡 著
灰犀牛 | 中信出版集团

芬兰的国家课程大纲每十年会进行一次改革，最新一轮课程改革在2016年完成。在这轮课纲改革中，芬兰推动以发展系统思维和全球竞争力为导向的现象式学习法，使得芬兰成为打破学科界限、使用高效学习法整合不同学科的全球教育改革先锋与领导者，其教育成效保持在国际排名中的领先地位。科丝婷·罗卡从2005年开始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担任教育心理学教授，在《现象式学习》中介绍了现象式学习的哲学背景、教学模式，对具体的现象式教与学的方法进行了分析和举例，并且对如何评估现象式教学项目、如何应对现象式学习中出现的新的挑战做了梳理。

深入茫茫林海的旅行者

□王淼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并不是一部新书，它成书于二十世纪初期，是俄罗斯著名旅行家兼地理学家阿尔谢尼耶夫对乌苏里地区进行探险考察时所写的地理考察报告。内容既包括考察队行进路线的地理记述和自然概况的调查，也有对这一地区居民生活状况的描绘；书中文字既有着极高的地理学价值，又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科普考察而兼有艺术气息，使这部作品弥足珍贵。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苏]弗·克·阿尔谢尼耶夫 著
西蒙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能；他对于人类秉持着一种本能的仁爱之心，不分种族，不求回报；他热爱大自然中所有的生命，无论动物，还是植物，甚至对待蚂蚁这样的小生灵也一视同仁。这位万物有灵论者始终对大自然抱有敬畏之心，他将原始森林视作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珍惜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他虽然命运凄惨，却从不怨天尤人，毋宁说在他身上体现出的正是人性中最为美好、动人的一面。

不过，德尔苏虽然在原始森林中生活得自足丰盛，如鱼得水，但他却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他无法理解人类社会的各种生存规则，对现代都市人的虚伪与贪婪更是极度反感、深恶痛绝。所以，当年迈的德尔苏跟随作者来到城市居住时，他根本无法适应现代化的都市生活，最后也不得不返回到自己的家园，并不幸在睡梦中死于盗贼之手。在德尔苏死后不久，大片的原始森林即被人类开采殆尽，各种动物和植

物的数量开始急剧减少，作为最后一位“野蛮人”，德尔苏的形象也就此定格在阿尔谢尼耶夫的笔下，成为人类早年美好生活的一种象征。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又是一部探讨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大书。作者以充满诗意的文字描绘了自然界的风物与生灵——无边无际的森林，浩瀚无垠的大海，姿态各异的奇卉异木，各种各样的珍稀动物……大自然的千变万化既让人啧啧称奇，又让人不自觉地产生一种神圣的敬畏感，其间细微之处，无不饱蘸着作者对自然和生命的由衷赞叹——在作者的笔下，马鹿之间的求爱仪式并不啻于是一次生命的美丽的舞蹈，而动物之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他看来也正是大自然最为精心的设置——毕竟，此消彼长、周而复始就是大自然的铁定规则，人类要做的只是顺应自然，而不是毫无节制地攫取，因为顺应自然就是在保护自己，疯狂攫取却只能自食其果。

然而，作者的警示仍然无法遏制时代的趋势，“大地的生产能力”虽然很强，却依然强不过商业与金钱的力量。作者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兽多林密的乌苏里地区就会变成一片荒漠”，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今天的现实。的确，在我们生存的土地上已经越来越难以找到苍莽的原始处女林了，那些可爱的动物与美丽的植物也逐渐远离了我们的视野线，这固然是人类文明进程必然付出的代价，同时也未尝不是人类急功近利的结果——从这个角度上说，阿尔谢尼耶夫的记述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他对自然环境的关注却仍然值得我们思考。

有人曾将《在乌苏里的莽林中》誉为“堪与《瓦尔登湖》相媲美的绿色文学经典”，但与梭罗相比，阿尔谢尼耶夫的生活态度显得更为积极。对于他来说，每一次上路都是一次新生活的开始，他之所以愿意做一名“远离村落、深入茫茫林海的旅行者”，不仅仅是为了地理考察，同时也是对世俗生活的一种疏离——人生除了仕途经济之外，还有更为本色、更为有趣的事情可供选择——或许，在阿尔谢尼耶夫看来，只有这样的生活才能把握住人生的实质、无愧于生命的真实。